

于细微处看专业的世界观

■文/赵军

世界观在此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它指的是人们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在世界观的一般抽象当中,我们发现了自己了解世界的角度与立场,而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创作的态度,这些创作态度在电影人的作品所以重要,犹如在一个肌体当中存在着怎样的基因。

不过这里所说的世界观不是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当然它对于创作的影响意义也非常大。这里所说的是专业范畴的世界观,譬如在一部动画电影的构思和后面的建模当中都需要世界观的明确。这就是专业的世界观。本文指出的正是从专业的角度,从创作过程和影片剧情以及画面当中所看到的中国影视创作当中的世界观现象。

当前,宏大叙事正在不断地隆重上映,评论家们也在使用宏大叙事的笔触对之展开络绎不绝的宣传。本文从另一个侧面说说对于创作世界观的看法,这个看法便是细节的角度。宏大叙事不可能一直下去,而细节会回到人们,尤其是细心的观众重新注意的中心。

难道细节当中没有包含世界观吗?不是的。对于专业来说,细节就是创作当中的专业所在。这里也分两个段落。一个是创作的过程,一个是剧本、镜头、场景及表演等等。

《中国医生》正在上映,我发现的是这部影片在如此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却有着一个十分细微的拍摄细节,这里说的不是剧情,是拍摄过程中的细节。通过拍摄过程的专业程度,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剧组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部影片的,不因为它的宏大叙事,因为它是一部进入了专业领域的电影。我喜欢这种满怀敬畏的态度。

看电影,既要看宏观也要看微观,但是知道拍摄当中的细节有着突出的表现时,我往往会期待在这部影片中闪耀出感人的光芒,或者剧情的光芒,或者人物的光芒。我举着个例子,说明如此认真的导演,正是一个有着对于细节的经验的工作人员。我期待导演能够将工作当中的这样的细节贯穿到剧情和人物刻画当中。

《中国医生》拍摄权不容易,时间紧、任务重是老生常谈。关键的是它的故事已经打上了世界史的印记,它需要对中国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背书负责。在这种压力和责任感面前剧组有一个决定,所有专业细节必须有专业人员在现场把关,当医生对于拍摄的一个动作喊停的时候,摄制要当场停下来。

医院不是摄影棚,不是搭一个景可以了事。整个医疗过程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多,整个抢救新冠患者所主要经历的医学细节非常多。拍摄无细节不成戏,《中国医生》无细节不成电影。所以剧组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创作是自由的,但是到了每一个细节当中的时候,只要医生喊停,就应该是细节到位与否的标准确认的时候。

《中国医生》正因为拍摄周期非常紧张,所以这种只能称为一丝不苟的“喊停”制度,让我们肃然起敬。医生有权在影片摄制中间喊停,也许是老电影人的一种经验,这里导演值得尊重,医生当然值得尊重。这里投资方、出品方值得尊重,而剧组的这种电影意识更值得尊重。

并非所有医疗题材的影片都有这种意识。有的电影电视是将医生的形象拍得很随意的。随意到可以随便上下班离开岗位,上班中间不忘打电话谈恋爱,想调动就申请调动,对病人的咨询不在乎地应答,做手术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等等。

专业从来是神圣的另一个名称,而医生就是这个名称的最好指代。何止是医生,我们的官员、公务员、老师、警察和所有在职与临时的公职人员不都应该有这种敬畏心和底线原则吗!我想,《中国医生》的拍摄当中,一定有着无数次被喊停的时候。拍摄过程被喊停,结果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革命者》：历史叙事的“不虚”与“不拘”

■文/虞晓

只能从旁人对他的叙述中获得。

影片讲述历史的策略是再现“转述”,故事从三重时空和多个叙事视角之间展开。80年代的万安公墓是进入历史时空的入口,影片的主叙事线从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开始(1927年4月28日),他的生与死,引出不同的历史人物的叙述——杀还是不杀(张学良、蒋介石)、营救(李庆天)、思念(妻子赵纫兰)、审讯(陈独秀)、遐想(毛泽东)、就义。每一个人讲述的李大钊,在过往的时空中侧重不同的历史人物的人生维度,从而拼接成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一生。

转述本身带有叙事者的情感和立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缺乏史料的支撑,它并不能保证达到历史的真实。《革命者》用转述的叙事方式,是要建构起了李大钊和“中国革命最黑暗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互动关系。在与时代和人的互动中完成历史人物的塑造,而不是再现历史事件本身。就如同用众多的“不拘”通过历史之镜的折射,汇聚成一个最接近于“不虚”的历史语境。

它包括通过技术层面再现的历史生活场景,城市、街道、乡村、煤矿、监狱,这是李大钊散播革命火种的舞台;通过叙事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世道和人心,“三座大山”压迫下民众的苦难是革命的原生动力;它更让革命者真正“活”在了历史时空,这里面有充满烟火气的人情人性,有普通凡人的鲜活感受,更写出了先驱者受到

家的高度认同,他们服从国家整体的抗疫安排,对于中国政府会带领人民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这种精神和力量构成了德勒兹所提及的“底片”,这个底片在中国观众进入电影院之前,已经充分地将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理带入到《中国医生》之中。“电影并不仅仅在影像中,而且也在头脑中形成运动”,观众的心理预设已经与影像中的镜头语言达成对话,自动填补了各个镜头元素之间的缝隙。

张院长拖着腿一心为病人奔波在医院的各个地方,他对着妻子会流泪,但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个脾气火爆的湖北汉子;文婷医生作为专业医生,她刚毅果决,沉稳大气、刚柔并济,对着镜子食不知味地为杂货铺老板的死亡垂泪打动了多少人;陶峻医生医术精湛、个性鲜明,还因医疗条件和院长拍桌吵架;小羊医生从到医院开始什么都不懂,到跟着前辈学习苦练到最终能完成插管手术;满脸伤痕的护士小姐哭诉:“我一个月没回家了,我受不了了,我想走。”而这话语的背后却是父亲感染病毒却没床位,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医护人员是战胜疫情的前线战士,长期穿着防护服下的他们皮肤受损,但依然是世界上最美的人;第二是普通人群像,普通人在影片中既承载着疫情带来的灾难,也承载着继续生活的希望。年轻的快递员金仔和怀孕的妻子先后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从生病的惊恐崩溃到重症再到治愈重回社会生活,虽然病患的后遗症依然存在,但婴儿的啼哭声嘹亮到足以燃其所有的希望。影片并没有直接陈述疫情下普通人的沉重,而是以张枫一分钟的影像语言让人直接破防,“叔叔,我就是想知道,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办?”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让人泪目的地方,影片带来的共情而非滥情,每一个泪点都是疫情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影片超越观众预设,演技“爆表”的演员们将鲜活的人物形象立在屏幕之上,观影之前就有朋友告知,需要带上纸巾,这是一部很好“哭”的电影,的确,以真情实感带动影片进程足以打动人心。

国家认同与影像同构

作为新主流影片,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片有机融合在一起。近十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面

的历史局限和对历史的超越。

影片构建的历史语境是现实的,但在现实主义风格的镜像体系中,不时会出现表现主义风格的视听段落,比如用舞台化的布光表现黑暗和光明的分野,用红旗下的舞蹈表现星火燎原的欢欣鼓舞。《革命者》通过将人物情感世界的外化,是用影像的“不拘”表达人物内心的“不虚”。

可以说,影片追求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效果,相较于再现历史的“不虚”,它更侧重于历史时空中人物内心立场和情感的真正,不同场景中情绪状态和心理的真实。这超越了对历史事件的复述,让今天的观众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因为只有进入内心,我们才能看到革命者想的是什么,才能知道他为什么要革命。

这是管虎在革命历史人物书写中力图解决的一个新难题,历史叙事如何与今天的观众实现“对话”?为此影片不仅打破了现实的时空逻辑,还采用复杂叙事的形态,让叙事文本自身实现了对观众的“召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对影片的叙事时空重新组合排列,产生意义。

构成李大钊生平,被转述的故事,也构成了他革命先驱者的成长史。发动煤矿工人的抗争,反抗的是残酷的资本逻辑;联合各行业工人为报童讨回公道,反抗的是帝国主义强权;号召学生的抗争,反对的是北洋政府的卖国;促成国共合作,为的是真的能有民生主义……《革命者》的

《中国医生》：

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底片”之上的影像陈述

■文/蒙丽静

建党百年的大型活动刚刚结束,

《中国医生》带着满腔的情怀以强有力的姿态开启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三票房超3亿元。中国的主旋律影片,转向新主流影片的类型片特征又一次凸显无疑,“泪奔”、“神一样的演技”、“中国加油”、“感谢”、“致敬中国医生”……观众在各种平台主动发布这样的词语,良好的共情能力让电影口碑节节攀升。

疫情伤痛构筑的历史“底片”

《中国医生》是根据现实改编的电影,抗击新冠疫情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死亡有战斗,而这样一场战争却罕见地让当代中国人全部参与其中,毫无疑问,医护人员就是冲锋在前线的战士。《中国医生》描述的就是发生疫情暴风眼“金银潭医院”的故事,从武汉疫情暴发到2020年3月10日方舱关闭,中国医护人员功不可没。制片方于2020年3月就已经开始筹备创作影片,这样快速的反应使得影片在院线上映的时候,人们还对新冠疫情有着清晰的记忆。

德勒兹在运动——影像理论中曾用到一个词——“底片”,这个词用在《中国医生》的观众上相当贴切,在导演以蒙太奇手法创作影片、联结各类镜头元素背后,是观众亲自体验的、2020年那个前所未有的疫情灾难。对于《中国医生》这样以中国疫情为题材、贴近生活的影片,观众在观影时是根本无法做到超脱世外的,疫情的沉重让他们总会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情绪带入影片。为了有效控制疫情,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还未完全从疫情脱离出来的全国观众,有着对全国抗击疫情疫情的全部记忆,在这个记忆中,每天新闻的公告,每个防疫措施的实施,每个为战胜疫情做出努力的人,桩桩件件还历历在目。从武汉停摆到开放,全中国的人们目光都曾聚集在那里。中国人民面对疫情时表现出对国

家的高度认同,他们服从国家整体的抗疫安排,对于中国政府会带领人民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这种精神和力量构成了德勒兹所提及的“底片”,这个底片在中国观众进入电影院之前,已经充分地将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理带入到《中国医生》之中。“电影并不仅仅在影像中,而且也在头脑中形成运动”,观众的心理预设已经与影像中的镜头语言达成对话,自动填补了各个镜头元素之间的缝隙。

新主流大片的有效建构

从主旋律电影升级换代到“新主流大片”,电影创作中已经从最初类型化转向的尝试变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创作模式。刘伟强导演从《中国机长》到《中国医生》已经有更多的经验,并将香港电影故事性强的电影语言特性引入其中。观众对疫情的深刻记忆,使得导演想要绘出超越“底片”颜色的作品并不容易,导演也在采访中多次提及拍摄《中国医生》的压力巨大。影片是诚意之作,在追求真实的目标上不遗余力,除去1:1地复原真实场景,对于医护人员疫情期间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流程也是完全复刻,这对于观众来讲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而丰富多面的人物群像更是本片的最大亮点。

以点带面是刘伟强导演擅长的做法,面对中国抗击疫情这个庞大的主题,导演选择了以金银潭医院这个被称为“疫情暴风眼”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塑造人物群像的手法打造出整个的抗击疫情全景图。第一是医护群像,作为有着丰富的导演经验的刘伟强,在塑造抗疫英雄形象的时候有血有肉,立体而丰满。他以紧张的抢救工作和大型的抢救手术来展示中国医生精湛的艺术和令人钦佩的医德。对于英雄的塑造有了新的定义,影片并没有变成类型化的英雄形象,而是将医生放回至生活常态之中,身患渐冻症

叙事模式如同《公民凯恩》,只不过后者是在对报业大亨“玫瑰花蕾”之谜的追寻中,消解了资本主义成功的神话,前者是在不停的聚合中,让革命者的生平渐渐成型。可以说,《革命者》是献礼片范畴内的“现代电影”。

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李大钊并不是神,他是看到身处的时代太黑暗,所以要尽自己力量去创造理想“新世界”,这个世界无非要国家富强,不致亡国奴;生活幸福,不再人命不如骡马。

影片的叙事遵照情感逻辑而显得“不拘”,大量不同时空,但相同情绪的镜头被剪辑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

当然,最具情绪感染力的“蒙太奇”并不在影片内部,在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的时间节点,它来自于文本内容和当下现实在观众内心的链接,来自于革命者以生命献祭的矢志初心,和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之间的对比/冲撞。《革命者》用“不拘”的历史书写,达成了“不虚”的现实表达,在这个维度上,它完成了献礼片的功能和意义。

《革命者》和《1921》用对历史叙事“不拘”与“不虚”的不同路径,实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用电影化的方式去塑造历史中的人。当主旋律电影不再单纯依靠技术和奇观,重新关注人的故事,这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

对突发事件或其他国际性危机事件都比以前表现得更为自信和强大,电影已经开始将这种气质渗透其中。《中国医生》响应着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作精神,将中国面对疫情的各种主张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影像来表现抗疫时期宏大的国家理念和各项政策,这对于商业类型片是一个难点。影片采用了以《新闻联播》为标识办法推进叙事的动态变化。

导演在结构故事的时候,以《新闻联播》为节点的表述手法非常特别,对于这个当代媒体频频出现在电影之中,甚至直接承担故事叙事功能,这在其他影片中是很少见的。现实中的《新闻联播》通常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作为具有极高可信度的官方主流媒体,由它来替党和政府向中国乃至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看新闻联播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尤其是疫情期间,获得最为准确有效的疫情信息就来自于新闻的传递。影片把握到了这一点,从一开始新闻播报出现不明病例开始,到每一个推动故事发生变化的节点,都由《新闻联播》承担动态演绎的变化,从封城与世卫组织的定论,到党中央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到全国人民争先报名奔赴疫情重灾区,再到响应国家号召居家抗疫,从治疗方案的讨论,到治疗每一个年龄段的人,80岁的老人依然会受到细心呵护,从疫情的混乱恐慌到方舱医院的建立,都容纳在这个短短的影片体量之中。由此,国家形象赫然而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达到空前一致。

疫情还尚未完全退去,中国人抗击疫情的历史记忆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人众志成城的大国精神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医生》或许不是完美之作,但在电影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笔划。